

隔離還是聚合？民主轉型過程中軍人 政治態度持續與變遷

余一鳴*

《摘要》

軍人是廣義的公務員，在民主化的過程中軍隊往往扮演關鍵性的角色。因此，了解軍人在民主化過程中的政治態度變化，成為觀察民主轉型的重要指標。本文透過 1999、2003、2010 及 2014 年等 4 個時期的實證調查資料，分析 16 年來軍隊政治態度的變遷狀況。研究結果顯示，國軍在民主化的過程中，除了公民責任感呈現下降的趨勢，其他的政治態度並沒有因為政黨輪替而出現巨幅改變，在與公民角色相關的政治態度上呈現與民間社會一致，而在與軍人角色相關的政治態度上呈現差異。雖然，軍隊在政治信任感普遍不高，但受到文人統制概念的約束，使得軍隊始終扮演著民主體系的捍衛者。

[關鍵詞]：文人至上、民主鞏固、文人統制、文武關係、政治發展

投稿日期：107 年 11 月 7 日。

* 國防大學政治系教授，e-mail: yuimingtw@gmail.com。

壹、前言

隨著民主化的浪潮席捲全球，相關的研究蓬勃發展。尤其是「軍文關係」（Civil-Military Relations）被視為民主發展中的關鍵因素，使得該議題在民主研究占有重要的地位（Przeworski, 1992）。臺灣雖然已進入民主鞏固的階段，但對於臺灣軍文關係之研究，卻缺少應有的關注。Huntington（1981: 70-72）認為民主制度下的文人政府可以透過「主觀文人統制」（subjective civilian control）及「客觀文人統制」（objective civilian control）等的手段來實踐文人統治。前者主要透過陞遷及制度化等手段控制軍隊，而後者主要是透過教育與價值觀的塑造，養成軍人服從文人的信念，讓軍人透過內在道德價值的自我約束，以達成「文人統制」（Civilian Control）目的。

以往對臺灣軍文關係探討的焦點，大多集中在制度性等主觀文人統制議題的探討，如鄭曉時（1992）從列寧式的黨軍關係探討臺灣早期的軍文關係；蔡明惠與林長安（2005）分析澎湖地方的軍政互動等，缺乏從客觀文人統制的觀點進行研究。客觀文人統制的研究之所以常被忽視，可能受到社會禁忌及軍事機密等因素限制，相關的資料蒐集困難，形成臺灣文武關係研究的缺口。

回顧以往的研究，雖然提供制度性的解釋，說明臺灣文武關係的變遷。然而，在此民主轉型的過程中，軍隊的政治態度是如何轉變的，又為什麼臺灣的軍人在民主化的過程中會順服文人的領導？臺灣文武關係的轉變有沒有客觀文人統制因素的影響？是不是在民主化的過程中某些有利於民主轉型的態度與價值已存在於軍隊中，為民主轉型中的軍文互動提供了有利的社會基礎。據此，本研究嘗試透過縱貫性（1999-2014）的資料分析，進行軍人相關政治態度的研究，藉以理解我國軍隊在長期民主化的過程中，有關政治態度的改變情形，以彌補以往的研究缺口。

貳、民主化與軍人的政治態度變遷

一、臺灣民主化過程中的文人統制

（一）民主化與文人統制

文人統制是民主國家維持民主政治體制的根本。英、美等民主國家，其政府體

制最重要的基本原則之一是「文人凌駕於軍隊之上」，這一原則的落實有賴於「文人對軍隊的控制」（Kemp & Hudlin, 1992: 7-9; Levy, 2016）。依照 Huntington（1981: 1-6）的觀點，軍人與文人是社會兩大權力競逐集團，而所謂文人統制就是文人集團如何在權力的競逐過程中確保自身權力的優越性，也就是如何讓文人集團保有最終政治的決策權。Huntington 認為文人集團主要透過兩種方式來實踐文人凌駕於軍人之上，即主觀文人統制與客觀文人統制兩種方式。主觀文人統制指的是最大限度的擴張文人權力，透過文人權力的擴張來達到對軍隊的控制，最常見的手段是以憲法或制度性的形式進行，例如高階軍官的任免或國安政策制定等。客觀文人統制則是指最大程度提高軍事專業主義，即透過軍事專業等價值觀的培養，讓軍隊從態度上養成服從文人治理的價值觀。

簡單來說，主觀文人統制主要透過制度性的約制，而客觀文人統制則是藉由價值觀的型塑，來達成文人統制軍人。其中，又以客觀文人統制扮演關鍵性的角色。Huntington（1981: 1-30）認為客觀文人統制不僅可以從價值信念來約束軍隊，更重要的是塑造出文人統制的社會氛圍。當社會普遍接受文人統制的理念，軍人干政就很難獲得社會大眾的支持，若軍人干政得不到民眾的理解，便減緩了軍人干政的動機。此外，當軍中普遍建立服從文人的價值，便從心理上限制了軍隊干政的動機（Chambers & Waitoolkiat, 2016; Connaughton, 2017; Finer, 2017: 23-25）。服從文人統制的觀念一旦建立，無條件服從文人統制便成為至高無上的價值，使軍人產生服從文人便是道德，違反文人統制，便是不道德的倫理約制。因此，Huntington 認為當社會與軍人普遍的接受這樣的價值信念，便可以有效約制。

（二）臺灣早期的軍文關係

Cheng（1989）以「準列寧式黨國體制」（quasi-Leninist party-state system）來形容早期臺灣的政治運作，這種體系的特徵在於透過黨來控制國家與軍隊。黨的文人菁英在軍隊中安插忠於他們的軍官，以控制軍事菁英。以往研究臺灣早期的黨國體制的學者認為（若林正文，1994；Kuehn, 2008），國民黨透過對社會的全面控制，使得政治體制具有高度的控制力與回饋力，因而能選擇適當時機發動並掌握轉型的路徑、規模與速度；且透過操縱轉型的行進過程和制度設計，保持優勢的執政地位。黨在臺灣民主化的初期扮演著文人的角色，而將軍文相互競逐政治權力吸納

於黨的體制之下。根據鄭曉時（1992）及 Cheng 與 Haggard（1990）研究臺灣早期的文武互動，他認為國民黨將軍事菁英納入黨的體系運作當中，在某種程度上消除了文人與軍人的對立，即使當文人與軍人集團出現矛盾對立時，那也是菁英之間的派系對立，而不是黨與軍的對立，透過制度性的安排，化解民主轉型過程中軍文間的權力衝突。此外，鄭曉時還發現除了將軍事菁英納入黨的運作之外，並且於軍隊發展黨組織，形成「黨中有軍、軍中有黨」。透過這樣的黨國體制，來實踐文人對軍人的控制。

（三）蔣經國的民主化與軍文關係

Cheng 與 Haggard（1990）研究臺灣民主化轉型時認為，臺灣的民主化係來自於美中建交後，改變臺灣的國際地位，使得臺灣面臨國際生存壓力，促使蔣經國執政晚期，調整反攻大陸的政策及臺灣進行民主化。政策的調整使得軍隊在國家整體發展重要下逐步下降，例如，軍方在國民黨的中常會比例大幅下降，軍方退出社會監控與情治系統。Cheng 與 Haggard 認為，由於臺灣民主化並非是來自於民間的壓力，而是迫於國際情勢，同時，改革係由蔣經國主動發起，這一方面有效壓制軍隊的反彈，另一方面則較易被軍方所接受。Cheng 與 Haggard（1990）認為民主化過程引發軍方因社會動盪而產生疑慮，主要是由於文人政府無法有效控制軍隊，而多數民主化的需求主要來自於外部的社會壓力，而這群外部的社會菁英並不具控制軍隊的經驗與能力，使得民主發生「回潮」（reverse wave），出現軍人干政。而臺灣的民主化則是由國民黨內部發動，除了透過黨國體制對軍隊進行有效調控，同時，還透過政戰體制對軍隊進行監督及宣導。

（四）李登輝的民主化與軍文關係

李登輝雖然不具備控制軍隊的政治經驗，但李仍能藉由黨軍體制約制軍隊。於此，李為強化權力的合法性，也企圖透過軍隊宣傳系統，強調軍隊應服膺依據憲法選舉的總統，軍隊忠黨愛國的教育內涵，開始轉向民主憲政的宣導（Lee, 2007）。Bullard（1997）在探討臺灣民主轉型的軍文互動時就發現政治教育做為黨控制軍隊的工具，但也為軍人服從文人統制奠定基礎。同時，也有部分學者發現類似的現象。例如，李東明（1998）分析解嚴後的軍隊政治教育的內涵，他認為軍隊政治教育從 1949 年的反共、反臺獨，到李登輝主政時期轉向以民主憲政教育為主軸。陳

膺宇（1996）分析 1993 年軍隊政治教育內涵，發現軍隊教育除了強調對領導者的效忠之外，也開始宣導民主的價值與內涵，並開始注意到軍人在民主憲政下的政治角色。

Lee（2007）及 Kuehn（2008）普遍認為臺灣軍隊服膺民主化的政策，係受到來自於黨的內部要求，初期則是透過政戰系統宣導這方面的價值。而到李登輝時期除了基於政權合法性的需求，配合宣導軍隊應服從民選政府之外，軍隊也開始面臨國家化及專業化的挑戰，使得政治教育的宣傳內容，由原來強調民主價值，開始更進一步宣導軍隊在憲法中所扮演的角色。

顯見，臺灣民主化的初期，軍隊之所以服從文人政策，主要是由於改革係由執政黨所發動，並非來自於外在的社會壓力，使得軍方願意配合執政黨政策。當軍隊內部建立起文人統制的觀念之後，為後來的政黨輪替軍隊服從依法所產生的領導者奠下基礎。以往的研究認為，軍隊總是阻礙民主發展。然而，部分的文獻卻指出，臺灣軍隊在民主發展過程中，並沒有出現過多的抗拒，反而是伴隨著臺灣民主化的腳步而改變，透過憲政教育鞏固文人對軍隊的控制。總之，我國軍隊透過民主教育強化文人對軍人控制的合理性，為後續臺灣的民主轉型的軍文互動奠定基礎。

二、軍人政治態度與變遷

一般認為軍人與文人之間在政治態度有明顯的差異。從社會化的角度而言，軍人受到職業特性的影響，具有追求安全或社會穩定的傾向，這使得軍人在政治態度上往往偏向保守性的政黨，如美國多數的軍人或退伍軍人有較高的共和黨色彩（Dempsey, 2009; Teigen, 2006）。其次，從成人階段政治社會化的角度來看，重大的政治經驗是政治態度轉變的重要來源。Sigel（1989）及 Erikson 與 Stoker（2011）比較越戰時期美國的成年人時發現，是否有參戰經驗在政治態度有明顯的差異，有戰爭經驗者比較偏好具保守主義傾向的共和黨。顯示，軍事經驗對個人的政治態度有一定程度的影響，軍事經驗愈豐富或受到軍事社會化的時間愈長的人，愈有保守化的傾向。

顯然軍人的特殊工作環境可能造就不同於民眾的政治價值觀，關於軍人與民眾的價值差異，一般有兩種不同的觀點—「聚合」（convergence）及「隔離」（segregation），分述如下：

(一) 聚合

Janowitz (1977: 51-53) 從工業化與民主化的角度描述軍隊價值的變遷，他發現受現代科技影響，軍隊與民間的專業愈來愈接近，形成「軍事文職化」(the civilianization of the military)。他認為國家受到市場競爭與經濟利益導向等影響，導致社會逐漸邁向民主、自由與開放，民眾對於多元價值認同與政治參與需求日益提高，而軍隊是社會的縮影，軍隊的成員來自於社會，自然軍人的態度會受到民間社會的文化與價值影響。其次，Janowitz 認為，由於民主化過程受到軍事專業技能的擴大，軍隊需要大量的文職技術人員協助武器維修與操作。再加上社會環境的變遷與兵役制度的改革，大量以經濟為考量之志願役人員加入軍旅行列，當兵從「志業」轉為「職業」，軍人價值逐漸與社會職業價值聚合，這種軍事文職化使得軍人與民間社會價值日趨於一致。因此，他認為隨著社會變遷及民主化與工業化，軍隊與社會的態度會逐漸傾向「聚合」。

(二) 隔離

軍隊是否因現代化或民主化而導致軍隊逐步融合於社會，Huntington (1981: 12-14) 卻提出不同的觀點，他認為軍人不同於一般職業，軍人隨時要為國犧牲，軍事專業是建立在利他的基礎之上，不同一般職業以營利為目的。他強調軍隊為了維護專業職能，會設法抗拒社會變遷過程中特定價值形成對軍隊的影響。例如強調個人利益或人性化的訓練，避免過度或嚴格的環境下操課等。Huntington 認為在民主化過程中，這種過度強調個人利益，忽視團體利益，或強調人性化訓練等（一定的溫濕度下才能操課），都會影響軍隊的服從性與戰鬥力。因此，他認為軍隊會刻意與社會「隔離」，以減輕社會部分特定的價值對軍隊戰力或專業能力產生影響。

綜上所述，對於軍隊在民主化可能呈現出兩種態度，一類認為軍隊會隨民主化而與民間的政治態度愈來愈聚合，而另一類則認為軍隊為強化的專業職能，必須隔離外在的影響，以維持軍事專業的態度與價值。那麼臺灣在民主化的過程，軍隊的政治態度是呈現什麼樣的狀況？

參、分析架構與資料來源

一、研究問題

Janowitz (1977) 認為民主化將導致軍隊價值與社會價值趨向一致，但 Huntington (1981) 認為軍隊為保有特殊的軍事文化以利於戰鬥任務的執行，軍隊設法抗拒來自社會的文化影響，以維持軍隊特有的團隊精神等價值。因此，本研究聚焦於探討，軍隊是否會隨著民主化的進展，而與社會價值愈趨於一致？還是固守特殊的職業文化？其中要驗證的假設包含：軍人隨民主化的進展有愈來愈接受文人統制的概念？文人統制的政治態度會隨著政黨輪替而出現變化？軍人的政治信任或公民責任是否高於民眾？軍人的政治信任或公民責任治會隨著政黨輪替而出現變化？最後，要問的是軍人對於自己的職業認同（軍人素質）是否高於民眾？軍人對於自己的職業認同會隨著政黨輪替而出現變化？

二、測量架構

受後設資料及研究目的限制，本研究所指的政治態度包含 4 個面向：公民責任、政治信任、文人統制及軍人素養。就社會角色而言，軍人亦是公民，但同時也是國家的公僕。雖然軍人擔負保國衛民的工作，但他又具有一般公民角色。軍人在政治系統當中即是穿著制服的公民，又賦有一般公民的權力。因此，除了觀察軍人在公民角色中具備的政治態度外，也關注特殊權力義務關係中，軍人在政治系統中的角色認知。另一方面，就態度的知覺對象而言，政治態度除了是指個人對於政治事物的主觀感受之外，亦包含個人在政治系統中應負責任的知覺。綜合社會角色與知覺對象兩個向度，構成 2*2 的分析架構（如表 1）。從公民角色而言，測量的面向包含內在對個人本身的政治責任與對外在政治系統的信任，個人內在的責任為「公民責任」，對外在系統為「政治信任」。從軍人角色而言，測量的面向也同樣包含內在責任的「軍人素養」與外在信任的「文人統制」，藉此了解軍人在社會角色及知覺對象上的態度差異。

表 1 政治態度之分析架構

		知覺對象	
		內在責任	外在信任
社會角色	公民	公民責任	政治信任
	軍人	軍人素養	文人統制

資料來源：研究者製作。

三、政治態度的內涵

(一) 政治信任

Stokes (1962) 認為，政治信任是指民眾對政府施政的評估與偏好，即對政府在感情上的喜好程度，雖然政治信任是來自於政府的施政表現，但是這種施政表現被民眾主觀知覺之後所形成的情感表現，即為政治信任感 (Hetherington, 2005)。當民眾主觀上認為政府施政表現符合期待時，則表示民眾對政府的施政愈有信心，即民眾的政治信任感高，政策的推動也較為容易；反之，當民眾對於政府施政信心較低，即民眾的政治信任感低，政策的推動就會受到較大的阻力 (陳陸輝，2006：40-41)。由於政治信任感在於測量民眾對於政府施政的評價，因此，一般都以「政府」或「政府官員」為研究標的 (Muller & Jukam, 1977)，以了解政府或政府官員施政是否符合民眾的期待，例如「政府官員做的事都是正確的」之類的問題，本研究的問題有「大多數的政府官員，都會愛惜公家財物。」、「大部分的警察會負責管好社會秩序。」及「政府會為人民解決困難，我們不必自作主張。」如果愈認為政府官員做的都是正確的事，或大部分警察會負責管好社會秩序，以及政府會主動為人民解決問題者，代表政治信任感愈高，反之，政治信任愈低。(如表 2)

Warren (1999) 長期觀察民主國家的政治發展，他發現受到政府透明及資訊發達，提高民眾對政府的施政期待，民眾對於政府需求不斷提升，政府的政策制定與執行能力並沒有相對增加，或是當增加的幅度不如預期，民眾需求得不到滿足，公民會變得更加憤世嫉俗，影響民眾對政府施政的信任。陳陸輝 (2003) 及陳義彥與陳陸輝 (2002) 研究臺灣民眾的政治信任感也發現類似的現象，目前臺灣民眾的政治信任感，有逐步下滑的趨勢。劉嘉薇與黃紀 (2010) 則以「定群追蹤」(penal

study) 的方式，研究陳水扁執政時期（2004-2007）臺灣大學生的政治信任感，他們發現政府施政弊端導致大學生對政府產生負面看法。不過，以往研究均發現（盛治仁，2003；陳陸輝，2006），政治信任感與政黨認同有密切的關聯，也就是當執政者是自己所認同的政黨，政治信任感會高於不認同該黨的民眾。一般而言，軍人相較於民眾有較高的愛國心，同時又是政治體制中的一員，應該有較高的政治信任。其次，臺灣軍隊受歷史淵源及職業特質影響（Fravel, 2002; Lee, 2007; Sun, 2001），一般認為有較高的國民黨認同，那麼這樣的政黨認同，會不會因政黨輪替而影響政治信任。

（二）公民責任

Campbell、Gurin 與 Miller（1954: 194）認為公民責任感是，個人感覺到不管參與的政治活動是否值得或是有效，每個公民都應該參加此政治過程。換言之，公民責任感是一種內化的主觀感受，用以測量個人在國家當中應扮演角色之責任感，當公民責任感愈高者，愈能履行公民權利與義務；公民責任感愈高，政治參與也愈高。因此，在測量公民責任感時大多從是否主動參與政治活動著手，以了解個人主觀上對於參與政治活動的看法。例如，是否因為基層選舉不重要，所以就不會主動參與等。因此，本研究的問題有「鄉鎮民代表選舉不重要，去不去投票都沒有關係。」、「每次選舉都有很多人去投，所以自己投不投，沒有多大關係。」及「政治是少數人的事，與多數人無關。」如果愈認為基層選舉不重要或很多人會去投票，自己不投並沒有什麼關係，以及認為政治是少數人的事，那麼代表這個人的公民責任感就愈低，反之，則愈高。（如表 2）

根據 Almond 與 Verba（1963）的研究，他發現依據各國政治文化的差異，民眾對於公民責任有不同的看法。在偏狹的政治文化（parochial political culture）當中，民眾的公民意識對政治角色與作用並不積極，也未對政治體系抱持特別的期望，而臣屬導向的文化當中，民眾的公民意識會受到政治體系影響，而對政府施政抱持一定的期許；至於參與文化當中，公民積極關心政府的施政投入與產出，並了解自身對政府決策制定的作用與功能。因此，民眾會產生較高的公民責任感。

以往的研究認為公民責任感受到政治文化的影響。Pye（1988）在研究儒家政治文化時就指出，華人習於服從威權，使得華人社會長期處於臣屬政治文化的狀態之下。根據彭懷恩（1997：152）的觀察，解嚴以前的臺灣民眾雖然也將政治參與

視為公民的責任，但他們普遍關心的是經濟、工作與家庭問題，政治問題不是他們會關心的事物。他們雖然也會參與投票，但只是基於政黨忠誠與政策的指導進行投票。根據 Almond 與 Verba（1963）的觀點，臣屬政治文化下的公民，雖然也會對政治表達關心，但他關心的可能是政策的輸出，而不會對政策的過程感興趣。若他們關心選舉，關心的內容是誰贏得選舉，而不是選舉如何進行。

整體來看，臣屬政治文化下的公民責任主要是基於對政黨的忠誠或是公民的義務為著眼，而參與的政治文化下的公民責任主要是基於對於個人意見表達或是公民的權力為著眼。當國家從臣屬走向參與的政治文化，民眾對於公民責任感的行使也會從義務觀點走向權力觀點，當政治義務的約束隨著民主化而瓦解，隨之而來的是權力觀點公民責任，使得公民責任從初期熱衷，而逐漸下降。陳光輝（2010）分析臺灣的投票行為發現類似的情形，認為民主化與公民責任與價值並非直線發展，在民主化的前期，公民受到民主經驗影響，讓公民有較多的學習經驗，使得民主價值中的公民責任感增加，然而到鞏固期之後，民主價值則呈現緩步成長，甚至倒退的現象。Huntington（1981）認為軍隊著重於團隊向心的凝聚，塑建官兵高度服從與國家認同。換言之，軍人對公民責任感的理解，具較高的義務傾向。Snider、Priest 與 Lewis（2001）則初步驗證了這樣的看法，軍人較習慣於傳統的政治參與方式，如投票等參政行為，對於向政府抗議或發表自己的政治觀點則較不習慣。

（三）文人統制

軍人服從文人領導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違反此原則被視為軍事政權（Levy, 2016）。在民主政治運作的邏輯當中，政府治理的權力來自於人民的同意，透過選舉的獲勝取得治理權。在民主國家當中，軍隊亦是政府機關的一部分，既然國家的治理來自於人民的同意，那麼身為行政組織成員的軍隊便有義務服從民選政府。同理，軍隊擁有管理致命性的武器之權力，係來自於人民的託付，透過選舉將公眾意志委託由政府來執行，因此，服從文人統制即服從人民的意志。所謂文人統制是指，在政治權威的分配中，軍隊只是政府的一部分，軍隊是在政府政策指導下運作，軍隊的任務只是政策的延伸，軍隊雖然可以基於軍事專業提出政策建議，但最終還是要服從文人政府的政策（洪陸訓，2002：165）。軍隊必須無條件服從人文政府的領導，軍隊在政治事務上應保持中立。也就是愈認同軍人應服從政府領導，或認同軍人應於政治上保持中立者，代表愈具備文人統制的觀念。根據以上的定

義，本文測量文人統制的題目有「不管任何政黨執政，國軍都要依憲法效忠國家。」（如表 2）等兩題。當受測者愈認同以上的觀點，代表認同文人統制觀點的程度愈高，反之，則愈低。

Diamond 與 Plattner（1996: ix-x）長期觀察亞非等國家民主發展，他發現在民主尚未成熟的國家當中，軍隊往往出面干涉政治，威脅國家正常運作與發展。但如果「文人至上」（civilian supremacy）的價值獲得落實，就可以將軍人活動範圍限制於國防政策領域，而不會去介入政治競爭與活動，讓民主發展進展的較為順利。Huntington（1981: 70-72）認為在民主化的過程中，往往因為某些因素而造成政治衝突與社會動盪，而對於將國家安全及社會穩定視為重要價值的軍人而言，往往提供軍人取文人而代之的動機。因此，軍人集團接受文人統制的程度，往往被視為民主化的重要指標。當軍人接受文人統制的程度愈高，愈能夠抑制軍人干政的動機，反之，則否。

（四）軍人素養

雖然每個職業都有其應負的責任，將職掌內的工作完成，即為每個職業的職責，然而，軍人保家衛國的工作職責，與一般職業存在很大不同的差異，軍人往往需要在戰場上履行任務，威脅個人的生命安全。為此，軍人必須塑建更高的職業認同，以強化任務達成率。軍人的專業動機是對他的專業技術的愛好和追求社會利益，而使用其技術的一份社會責任感。因此，志願役官兵應該比義務役官兵有較高的軍人素養。然而，Franke（2001）比較西點軍校與雪城大學在學學生，並沒有發現太多的差異。

Huntington（1981: 15）認為軍人既不像傭兵隨時可以因為高酬勞，而改變效忠對象，也不似傭兵或義務役軍人，只是為了個人或少數人的利益，執干戈以衛社稷，職業軍人常因強烈的愛國意識與責任感的激發而投效軍旅。此外，Huntington（1981: 63-65）從專業倫理的角度指出，當人們長期從事相同的行為，會發展出特殊和持久的思想與習慣。因此，長期從事同樣工作的軍人，也會發展出類似於一般職業倫理的「軍人心態」（military mind），主張團體優先於個人，重視秩序，強調合作，反對個人主義。由於軍隊強調團體，他以國家為唯一顧客，任何工作的執行都需要個人服從團體的意志，甚至基於任務需求而犧牲個人生命。因此，軍隊基於職场的需要會發展出相適應的素養，以配合軍隊特性或任務的執行等需求，而這

些特質本文稱之為軍人素養，即為擔任軍人所需具備的專業價值。

根據上述討論，軍人的專業價值應該包含，團隊合作、講求紀律。本研究測量軍人素質的題目有「為了團體的榮譽，個人行為應該以配合團體的要求。」（如表 2）等 3 題。如果愈認同上述內容代表軍人素養愈高，即愈認同團隊榮譽，反對個人主義或愈認同軍人應接受嚴格的訓練等價值者，反之，則愈低（如表 2）。

表 2 4 個面向政治態度之內涵

面 向	題 目
政治信任	1.大多數的政府官員，都會愛惜公家財物。
	2.大部分的警察會負責管好社會秩序。
	3.政府會為人民解決困難，我們不必自作主張。
公民責任	1.鄉鎮民代表選舉不重要，去不去投票都沒有關係。
	2.每次選舉都有很多人去投，所以自己投不投，沒有多大關係。
	3.政治是少數人的事，與多數人無關。
文人統制	1.不管任何政黨執政，國軍都要依憲法效忠國家。
	2.國軍應當在政治上保持中立；不應當干涉政治。
軍人素養	1.我認為團體的成就或榮譽，比個人成就或榮譽更重要。
	2.為了團體的榮譽，個人行為應該配合團體的要求。
	3.軍人應該接受嚴格的訓練，不應有任何怨言。

資料來源：研究者製作。

四、資料來源與處理

（一）樣本來源及基本特徵：樣本主要來自於 1999、2003、2010 及 2014 年國軍相關之實證調查的樣本，各時期採「依比例的多階段集群」（Probability Proportional to Size, PPS），其中區分成 3 個階段，分別為地區及軍種進行，第一階段為地區，主要以作戰區劃分依據，區分成北、中、南、東、澎湖、金門及馬祖等 7 個集群，第二階段以軍種區分，計有陸、海、空、聯勤、陸戰隊、憲兵等 8 個集群，第三階段則以基層連級為單位，最後，則依據官士兵的比例進行配額抽樣。各時期除了 2010 年的樣本較少，其他年度的有效樣本數，均超過 1,067 份。其次，由

於 2005 年開始推動募兵制，志願役的官兵數量漸增，使得基層部隊官兵的平均年齡有逐步上升的趨勢。年樣本平均年紀及性別比例調查時間及數量如表 3。

表 3 樣本的描述統計

	陳伯鏗（1999）	余一鳴（2003）	穆天威（2010）	余一鳴（2014）
志願役	310(18.7%)	451(20.8%)	72(24%)	768(69.7%)
義務役	1,346(81.3%)	1,720(79.2%)	226(76%)	333(30.2%)
性別（男女）%	96.3\3.7	97.4\2.6	97\3	92.8\7.2
年紀	21.54	23.9	24.67	26.34
調查時間	1998.9-11	2003.6-8	2008.11	2014.10-11
有效樣本	1,656	2,171	298	1,091

資料來源：研究者製作。

歷次研究雖然樣本檢定的結果並不是很理想，但仍顯示樣本與母體仍有一定的的一致性。例如 1999 年的樣本，則是以 1998 年國防報告書，所提供的兵力結構（軍種）及兵力素質（教育程度）做為檢定之依據。兵力結構樣本與母體一致，但教育程度並不一致，歷次的檢定結果，大概都是類似的狀況。不過教育程度不一致，很可能是本研究抽樣的是以基層單位為對象，而母體參照的數據則是來自於全體國軍，通常基層單位都是年輕的軍士官，同時低學歷的士兵也多集中在基層單位（如，高中以下學歷）。因此，在教育水平自然低於母體的狀況。從檢定中也的確發現，樣本有較高比例的低教育程度者，而高教育程度者相對較少。

（二）量表重編碼：雖然歷年問卷都為 Likert 量表。但 1999 年為 Likert 4 點量表，2014 為 Likert 5 點量表，2003 及 2010 年為 Likert 6 點量表。本研究以 2003 及 2010 年為 Likert 6 點為基準，分別對於 1999、2014 年的量表尺度進行調整，使得該年度的量表可以在同樣的尺度下進行比較。為使各年度的量表全距一致，同時讓各年度各選項距離一致，調整 1999 年的 4 點量表，由原來的 1 至 4，重新編碼為 1、2.66、4.33 及 6。2014 為 Likert 5 點量表，由原來的 1 至 5，重新編碼為 1、2.2、3.6、4.8 及 6。如此一來，讓 3 個全距不同的量表，可以相互比較，又不致於過度扭曲原始數據。

（三）軍文的對比：為了能夠比較文人與軍人態度上的差異。研究將志願役視之為軍人，而義務役代表民眾。由於職業軍人長期以軍事為業，受軍隊社會化影響

程度較深，在態度與價值上與一般民眾有很大的區別，而義務役的官兵也是軍人，也同樣受軍事社會化的影響，但這些人服役時間短，而且服役只是基於國民義務，和以軍人做為職業的志願役軍人在心態及本質上有很大的不同。其次，Huntington (1981) 在軍文關係所探討的軍人集團，指的是長期從事軍隊工作的職業軍人。研究分析時，將資料區分兩種不同軍人身分—志願役與義務役，主要目的在於了解軍(人)文(民眾)政治態度的差異，其間差異主要採用 t 檢定。

五、統計分析

第一個問題，本研究企圖藉由趨勢圖來觀察各時期軍隊政治態度的狀況，並藉 ANOVA 分析每個時期各種政治態度的差異狀況。第二個問題則是透過 t 檢定分析，志願役與義務役軍人態度上的差異，以了解軍隊與社會價值觀上的聚合或隔離。其次，由於本研究各時期的樣本數大多高於一千份以上，為避免樣本數對統計顯著造成干擾。因此，當達統計顯著時，研究還要觀察效果量 (effect size)，以排除樣本數對統計結果的干擾。換言之，在分析 ANOVA 或是 t 檢定時，若統計顯著未達小效果量，則將顯著水準視為樣本數所造成的效果，不具統計意義。

肆、分析

一、政治信任

以單因子獨立樣本 ANOVA 分析年度對政治信任之效果，結果如表 4。發現：志願役在不同年度的政治信任上無顯著差異， $F(3, 1596) = 1.41, p = .237, \eta_p^2 = .003$ 。而義務役在不同年度的政治信任上有顯著差異， $F(3, 3613) = 6.33, p = .001, \eta_p^2 = .005$ ，但效果量仍不到小效果的基準 (Cohen, 1988)。¹ 經 Scheffé 事後比較，1999 年 ($M = 8.54, SD = 2.92$) 與 2003 年 ($M = 8.54, SD = 3.01$) 沒有顯著差異 ($p = 1$)，2010 年 ($M = 9.43, SD = 3.34$) 與 2014 年沒有顯著差異 ($p = .005$)，1999 年與 2014 年 ($M = 8.49, SD = 3.34$) 沒有顯著差異 ($p = .996$)，2003 年與 2014 年沒有顯著差異 ($p = .997$)。只有 2010 年顯著大於 1999 年 ($p = .001$)，2010 年顯著大於 2003 年 ($p = .001$)。

¹ Cohen (1988) 認為 $.01 \leq \eta_p^2 < .058$ 為小效果量； $.058 \leq \eta_p^2 < .138$ 為中效果量； $.138 \leq \eta_p^2$ 是大效果量。

表 4 政治態度在 1999(1)、2003(2)、2010(3)及 2014(4)年之變異數摘要表

政治信任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η_p^2	Post test
志願役	年度	43.46	3	14.49	1.41	.237	.003	
	誤差	16352.27	1596	10.25				
	總合	16395.73	1599					
義務役	年度	174.39	3	58.13	6.33*	.001	.005	3 > 1 ; 3 > 2
	誤差	33197.07	3613	9.19				
	總合	33371.457	3616					
公民責任								
志願役	年度	8177.96	3	2725.98	216.54*	.001	.290	1 > 2 > 3 > 4
	誤差	20041.92	1592	12.59				
	總合	28219.88	1598					
義務役	年度	11427.74	3	3809.25	376.30*	.001	.238	1 > 2 > 3 > 4
	誤差	36503.09	3606	10.12				
	總合	47930.826	3609					
文人統制								
志願役	年度	104.96	3	34.99	8.50*	.001	.016	2 > 1
	誤差	6562.69	1595	4.12				
	總合	6667.65	1598					
義務役	年度	107.70	3	35.90	8.61*	.001	.007	2 > 1
	誤差	15052.255	3610	4.17				4 > 1
	總合	15159.955	3613					
軍人素養								
志願役	年度	152.09	3	50.70	6.51*	.001	.012	
	誤差	2425.94	1595	7.79				
	總合	12578.03	1598					
義務役	年度	23.64	3	7.88	.94	.421	.001	
	誤差	30270.83	3606	8.40				
	總合	30294.47	3609					

註：* $p < .001$

資料來源：研究者製作。

以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結果如表 5。發現：1999 年志願役與義務役在政治信任上並無顯著差異。 $t(1643) = .80, p = .43, d = -.051$ 。志願役的政治信任程度 ($M = 8.69, SD = 2.89$) 與義務役的政治信任程度 ($M = 8.54, SD = 2.92$) 沒有顯著差異。

在 2003 年志願役與義務役在政治信任上並無顯著差異。 $t(2619) = 2.61, p = .009, d = -.137$ 。志願役的政治信任程度 ($M = 8.95, SD = 2.97$) 與義務役的政治信任程度 ($M = 8.54, SD = 3.01$) 沒有顯著差異。2010 年志願役與義務役在政治信任上並無顯著差異。 $t(298) = .16, p = .875, d = -.020$ 。志願役的政治信任程度 ($M = 9.51, SD = 4.08$) 與義務役的政治信任程度 ($M = 9.43, SD = 3.34$) 沒有顯著差異。2014 年志願役與義務役在政治信任上並無顯著差異。 $t(1099) = 1.58, p = .114, d = -.102$ 。志願役的政治信任程度 ($M = 8.84, SD = 3.35$) 與義務役的政治信任程度 ($M = 8.49, SD = 3.34$) 沒有顯著差異，但各年度的效果量仍不到小效果之基準 (Cohen, 1988)。²

整體而言 (如圖 1)，各時期不管是義務役或志願役的官兵在政治信任上都低於中位數 10.5，大概都維持在 9 到 8 之間。就長期的趨勢而言，政治信任並沒有太多的波動，且任何時期在統計上均無顯著差異。³ 而且不管是義務役或志願役官兵都是如此。同時，義務役與志願役官兵之間在任何時期也都沒有顯著差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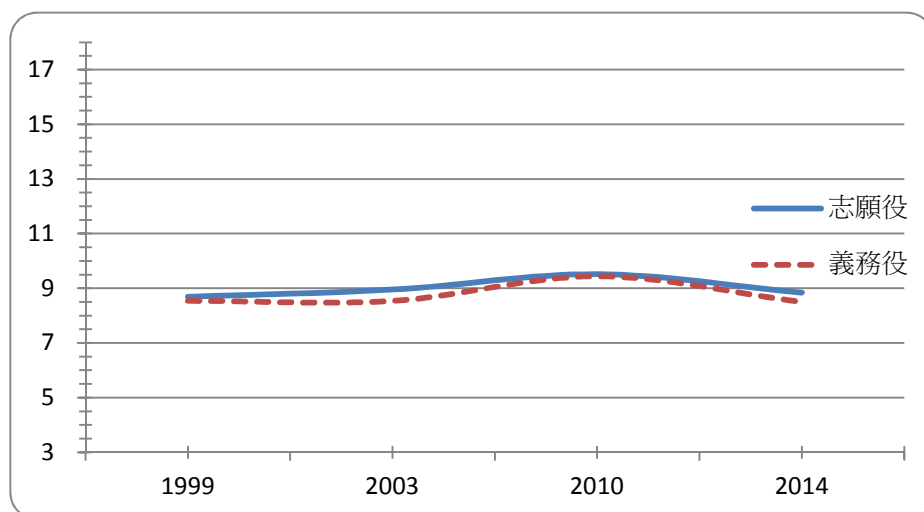


圖 1 1999 年—2014 年政治信任趨勢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² Cohen (1988) 認為 $d \geq 0.2$ 為小效果量； $d \geq 0.5$ 為中效果量； $d \geq 0.8$ 為大效果量。

³ 雖然義務役在部分的年度上存在統計上的差異，但這些差異都未達一定的效果量，其差異的來源可能是樣本數較大，影響統計的顯著度。

表 5 政治態度在義務役與志願役之獨立樣本 t 檢定

1999	平均數 (標準差)		df	t 值	p	效果量(d)
	志願役(N=309)	義務役(N=1343)				
政治信任	8.69 (2.89)	8.54 (2.92)	1643	0.80	.430	-.051
公民責任	14.47 (2.78)	14.40 (2.87)	1648	0.39	.700	-.025
文人統制	9.28 (2.15)	8.78 (1.89)	1646	4.05	.001*	-.258
軍人素養	13.51 (2.56)	12.52 (2.73)	1645	6.12	.001*	-.370
2003	平均數 (標準差)		df	t 值	p	效果量(d)
	志願役(N=451)	義務役(N=1720)				
政治信任	8.95 (2.97)	8.54 (3.01)	2169	2.61	.009	-.137
公民責任	13.37 (3.45)	12.77 (3.37)	2153	3.28	.001*	-.177
文人統制	10.01 (2.03)	9.08 (2.14)	2162	8.55	.001*	-.439
軍人素養	14.11 (2.87)	12.48 (2.93)	2159	10.51	.001*	-.559
2010	平均數 (標準差)		df	t 值	p	效果量(d)
	志願役(N=72)	義務役(N=228)				
政治信任	9.51 (4.08)	9.43 (3.34)	298	0.16	.875	-.020
公民責任	11.88 (4.09)	10.94 (2.50)	298	2.23	.020	-.321
文人統制	9.43 (2.16)	9.06 (2.17)	298	1.27	.206	-.171
軍人素養	12.86 (3.30)	12.22 (3.35)	298	1.45	.151	-.195
2014	平均數 (標準差)		df	t 值	p	效果量(d)
	志願役(N=768)	義務役(N=733)				
政治信任	8.84 (3.35)	8.49 (3.34)	1099	1.58	.114	-.102
公民責任	9.25 (3.82)	8.15 (3.73)	1099	4.45	.001*	-.291
文人統制	9.74 (1.97)	9.31 (2.04)	1099	3.26	.001*	-.216
軍人素養	13.55 (2.78)	12.62 (3.05)	1099	4.76	.001*	-.325

註：*p < .001

資料來源：研究者製作。

二、公民責任

以單因子獨立樣本 ANOVA 分析年度對公民責任之效果，結果如表 4。發現：志願役在不同年度的公民責任上有顯著差異， $F(3, 1596) = 216.54, p = .001, \eta_p^2 = .290$ 。經 Scheffé 事後比較，1999 年 ($M = 14.47, SD = 2.78$) 公民責任感大於 2003 年 ($M = 13.37, SD = 3.45$) 的公民責任感 ($p > .001$)，而 2003 年的公民責任感又大於 2010 年 ($M = 11.88, SD = 4.09$) 的公民責任感 ($p = .012$)，而 2010 年的公民責任感又大於 2014 年 ($M = 9.25, SD = 3.82$) 的公民責任感 ($p > .001$)。而義務役在不同年度的公民責任上有顯著差異， $F(3, 3606) = 376.30, p = .001, \eta_p^2 = .238$ 。經 Scheffé 事後比較，1999 年 ($M = 14.40, SD = 2.87$) 公民責任感大於 2003 年 ($M = 12.77, SD = 3.37$) 的公民責任感 ($p > .001$)，而 2003 年的公民責任感又大於 2010 年 ($M = 10.94, SD = 2.50$) 的公民責任感 ($p > .001$)，而 2010 年的公民責任感又大於 2014 年 ($M = 8.15, SD = 3.73$) 的公民責任感 ($p > .001$)。不管志願役還是義務役在每個年度的統計差異都屬於大效果量。

以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結果如表 5。發現：1999 年志願役與義務役在公民責任上並無顯著差異。 $t(1648) = .39, p = .70, d = -.025$ 。志願役的公民責任程度 ($M = 14.47, SD = 2.78$) 與義務役的公民責任程度 ($M = 14.40, SD = 2.87$) 沒有顯著差異。在 2003 年志願役與義務役在公民責任上有顯著差異。 $t(2153) = 3.28, p = .001, d = -.177$ 。志願役的公民責任程度 ($M = 13.37, SD = 3.45$) 與義務役的公民責任程度 ($M = 12.77, SD = 3.37$) 有顯著差異。2010 年志願役與義務役在公民責任上並無顯著差異。 $t(298) = 2.23, p = .020, d = -.321$ 。志願役的公民責任程度 ($M = 11.88, SD = 4.09$) 與義務役的公民責任程度 ($M = 10.94, SD = 2.50$) 沒有顯著差異。2014 年志願役與義務役在公民責任上有顯著差異。 $t(1099) = 4.45, p = .001, d = -.291$ 。志願役的公民責任程度 ($M = 9.25, SD = 3.82$) 與義務役的公民責任程度 ($M = 8.15, SD = 3.73$) 有顯著差異。除了 2010 年及 2014 年以外 t 檢定的統計分析達小效果量，1999 年及 2003 年的統計效果量仍不到小效果之基準。

從表 4 及圖 2 均可以發現，就長期的趨勢而言，公民責任感呈現顯著下降的趨勢，而且統計差異達大效果量，而且官兵的公民責任感在 2014 年均低於中位數 (10)。雖然各時期志願役的公民責任感均高於義務役，但早期的志願役與義務役

在公民責任感較為一致（1999 年及 2003 年的差異均未達小效果量的統計水準），但到後期則差異愈大（2010 年及 2014 年志願役與義務役的差異均達小效果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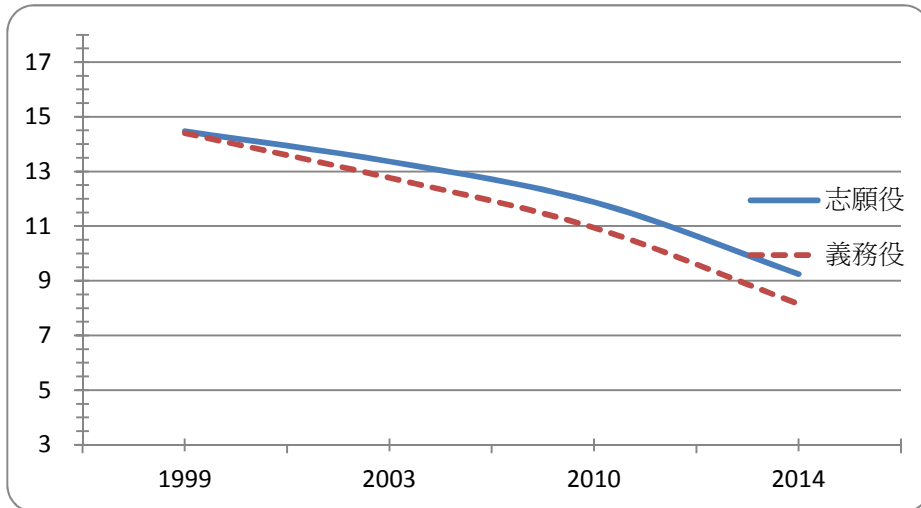


圖 2 1999 年—2014 年公民責任趨勢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三、文人統制

以單因子獨立樣本 ANOVA 分析年度對文人統制之效果，結果如表 4。發現：志願役在不同年度的文人統制上有顯著差異， $F(3, 1595) = 8.50, p = .001, \eta_p^2 = .016$ 。經 Scheffé 事後檢定，1999 年 ($M = 9.28, SD = 2.15$) 的文人統制小於 2003 年 ($M = 10.01, SD = 2.03$) 的文人統制，有顯著差異 ($p > .001$)。1999 年與 2010 年 ($M = 9.43, SD = 2.16$) 的文人統制無顯著差異 ($p = .953$)，1999 年與 2014 年 ($M = 9.74, SD = 1.97$) 的文人統制無顯著差異 ($p = .011$)。2003 年與 2010 年的文人統制無顯著差異 ($p = .166$)。2003 年與 2014 年的文人統制無顯著差異 ($p = .155$)。2010 年與 2014 年的文人統制無顯著差異 ($p = .685$)。而義務役在不同年度的文人統制上有顯著差異， $F(3, 3610) = 8.61, p = .001, \eta_p^2 = .007$ 。經 Scheffé 事後檢定，1999 年 ($M = 8.78, SD = 1.89$) 的文人統制小於 2003 年 ($M = 9.08, SD = 2.14$) 的文人統制，有顯著差異 ($p = .001$)。1999 年與 2010 年 ($M = 9.06, SD = 2.17$) 的文人統制無顯著差異 ($p = .297$)，1999 年的文人統制小於 2014 年 ($M =$

9.31, $SD = 2.04$) 的文人統制, 有顯著差異 ($p = .001$)。2003 年與 2010 年的文人統制無顯著差異 ($p = .999$)。2003 年與 2014 年的文人統制無顯著差異 ($p = .35$)。2010 年與 2014 年的文人統制無顯著差異 ($p = .59$)。志願役在年度的統計差異為小效果量, 而義務役在年度的統計差異低於小效果量。

以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結果如表 5。發現：1999 年志願役與義務役在文人統制上有顯著差異。 $t(1646) = 4.05, p = .001, d = -.258$ 。志願役的文人統制程度 ($M = 9.28, SD = 2.15$) 與義務役的文人統制程度 ($M = 8.78, SD = 1.89$) 有顯著差異。在 2003 年志願役與義務役在文人統制上有顯著差異。 $t(2162) = 8.55, p = .001, d = -.439$ 。志願役的文人統制程度 ($M = 10.01, SD = 2.03$) 與義務役的文人統制程度 ($M = 9.08, SD = 2.14$) 有顯著差異。2010 年志願役與義務役在文人統制上並無顯著差異。 $t(298) = 1.27, p = .206, d = -.171$ 。志願役的文人統制程度 ($M = 9.43, SD = 2.16$) 與義務役的文人統制程度 ($M = 9.06, SD = 2.17$) 沒有顯著差異。2014 年志願役與義務役在文人統制上並有顯著差異。 $t(1099) = 3.26, p = .001, d = -.216$ 。志願役的文人統制程度 ($M = 9.74, SD = 1.97$) 與義務役的文人統制程度 ($M = 9.31, SD = 2.04$) 有顯著差異。除了 2010 年以外 t 檢定的統計分析未達小效果量之外, 其他 3 個時期的統計效果量均達小效果之基準。

不管任何時期及身分, 文人統制均高於中位數 (7), 大多維持在 9 到 10 之間, 其中, 志願役雖然有達小效果量, 但義務役並沒有, 而且志願役在事後檢定, 只有 2003 年高於 1999 年。文人統制在長期的趨勢而言, 可以算只是持平的發展, 上升的趨勢並不明顯。在志願役與義務役的比較上, 各時期的志願役在文人統制方面均明顯高於義務役 (如圖 3 及表 5), 而且統計上的差異均達小效果量。⁴

⁴ 除了 2010 年為 .171 外, 其他都高於 .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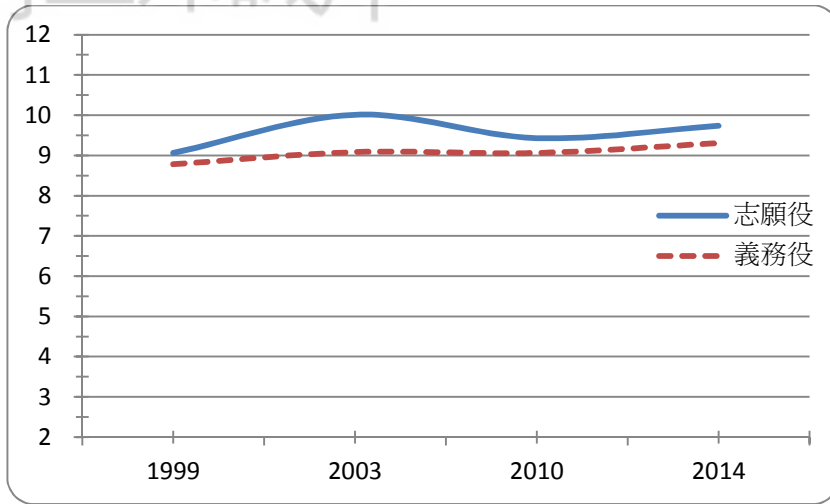


圖 3 1999 年—2014 年文人統制趨勢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四、軍人素養

以單因子獨立樣本 ANOVA 分析年度對軍人素養之效果，結果如表 4。發現：志願役在不同年度的軍人素養上有顯著差異， $F(3, 1595) = 6.51, p = .001, \eta_p^2 = .012$ 。經 Scheffé 事後檢定，1999 年 ($M = 13.51, SD = 2.56$) 與 2003 年 ($M = 14.11, SD = 2.87$) 的軍人素養無顯著差異 ($p = .043$)。1999 年與 2010 年 ($M = 12.86, SD = 3.30$) 的軍人素養無顯著差異 ($p = .36$)，1999 年與 2014 年 ($M = 13.55, SD = 2.78$) 的軍人素養無顯著差異 ($p = .999$)。2003 年與 2010 年的軍人素養無顯著差異 ($p = .006$)。2003 年與 2014 年的軍人素養無顯著差異 ($p = .010$)。2010 年與 2014 年的軍人素養無顯著差異 ($p = .266$)。而義務役在不同年度的軍人素養上無顯著差異， $F(3, 3606) = .94, p = .421, \eta_p^2 = .001$ 。其統計差異為小效果量。

以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結果如表 5。發現：1999 年志願役與義務役在軍人素養上有顯著差異。 $t(1645) = 6.12, p = .001, d = -.370$ 。志願役的軍人素養程度 ($M = 13.51, SD = 2.56$) 與義務役的軍人素養程度 ($M = 12.52, SD = 2.73$) 有顯著差異。在 2003 年志願役與義務役在軍人素養上有顯著差異。 $t(2159) = 10.51, p = .001, d = -.559$ 。志願役的軍人素養程度 ($M = 14.11, SD = 2.87$) 與義務役的軍人素養程度

($M = 12.48, SD = 2.93$) 有顯著差異。2010 年志願役與義務役在軍人素養上並無顯著差異。 $t(298) = 1.45, p = .151, d = -.195$ 。志願役的軍人素養程度 ($M = 12.86, SD = 3.30$) 與義務役的軍人素養程度 ($M = 12.22, SD = 3.35$) 沒有顯著差異。2014 年志願役與義務役在軍人素養上並有顯著差異。 $t(1099) = 4.76, p = .001, d = -.325$ 。志願役的軍人素養程度 ($M = 13.55, SD = 2.78$) 與義務役的軍人素養程度 ($M = 12.62, SD = 3.05$) 有顯著差異。除了 2010 年以外，t 檢定的統計分析未達小效果量之外，其他時期的統計效果量均達小效果之基準，甚至 2003 年的統計差異為中效果量。

軍人素養在長期的趨勢而言，義務役官兵長期來看並沒有什麼變化，而志願役官兵大致在 2003 年有上升而後下降的趨勢，但上升及下降的趨勢都不明顯，在統計分析上亦未呈現差異。在志願役與義務役的比較上，兩者的在軍人素養的態度上高於中位數 (10.5)。同時，各時期的志願役在軍人素養方面均明顯高於義務役 (如圖 4 及表 5)，而其差異均達小效果量。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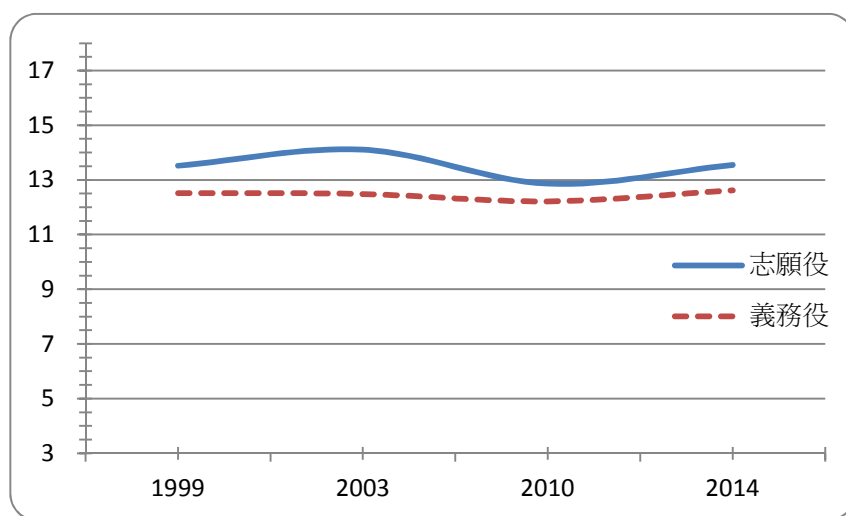


圖 4 1999 年—2014 年軍人素養趨勢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⁵ 除了 2010 年為 .195 外，其他都高於 .20，而且 2003 年甚至達 .559，已達中效果量的臨界值。

伍、討論

一、官兵的政治態度並未受到政黨輪替影響

就長期的趨勢看來（圖 1 至圖 4），除前述公民責任感呈現下降的趨勢之外，基層官兵在政治態度上沒有太多的差異。雖然公民責任在不同政黨執政呈現明顯程度上的差異，但長期來看是呈現穩定下降的趨勢，顯然並非受到執政黨的不同而產生的差異。也就是說，官兵在政治態度上，並沒有受到政黨輪替的影響。以往研究認為軍隊有較高的保守傾向，例如美軍傾向保守的共和黨。這可能是受到軍人職業屬性的影響，軍人對於社會動盪感到不安，尤其對國家或社會的紛爭感到焦慮，導致於軍人存在較高的保守的價值（Feaver & Kohn, 2001; Hooker, 2003）。一般認為我國軍隊也具有類似保守傾向，具有較高的國民黨偏好。因此在國民黨執政時期，軍隊會因為價值信念較相近而產生較高的政治信任，或在其他政治態度有相應的提升，反之，在民進黨執政時期，由於價值信念不同，而影響軍隊對政府的信任，導致政治信任或其他政治態度的下降。但本研究發現，不管是國民黨執政時期或是民進黨執政時期，都呈現相似的政治態度，並沒有因為執政的政黨不同，而產生態度上的變化。

這可能由於調查對象多為中低階層的官、士、兵，受到軍事社會化的影響還不大。其次，年輕人通常較具理想性與改革性，與軍人保守，尋求穩定的性格不同，或許是如此，使得年輕軍人在政黨認同上未出現明顯的不同，而導致政黨輪替前後並未呈現態度上的改變。另一方面，可能是受到長期以往軍隊強調了解政治而不干涉政治的觀念所影響，對於政治事務一向保持中立的立場，因此，政黨偏好並不會影響政治態度。

二、志願役的政治態度高於義務役官兵

志願役官兵的政治態度不管任何時期，始終高於義務役。這樣的研究結果與 Franke（2001）比較美國西點（West Point）軍校生與雪城大學（Syracuse University）學生的研究類似，他認為大學或軍事教育對於青少年的價值觀並不會產

生太多的影響，大學或軍校教育只會強化原有的認知。而且軍校教育與大學教育對學生價值觀的影響大多很一致。例如，在「軍事主義」(Warriorism)上兩所學校的四年教育都有助於其價值觀的提升，而在愛國主義及功利主義上都呈現下降的趨勢。不管下降或是上升，軍校的新生價值觀都是比較正向的，雖然四年之後價值觀有升有降，但軍校的畢業生在價值觀上都比一般大學畢業生正向。就社會化的各階段而言，青少年時期個人的政治態度通常已初步成型，對他政治態度主要的影響是來自於同儕之間，而不是學校或職業(Quintelier, 2015)。Franke 認為軍校及大學教育均受的社會環境或同儕影響，但軍校的教育對於社會負面價值的影響有較高的抑制力，而對於社會正向價值影響，也同樣有較高的推力。

其次，軍隊只是社會的縮影。什麼樣的社會，就存在什麼樣的軍隊，因此不管志願役或義務役官兵態度大多一致。但由於軍隊相對於社會封閉，使得軍隊的態度與價值受影響較為緩慢。再者，軍隊政治教育是學校公民教育的延伸，我國軍隊長期實施莒光日電視教學，在相對隔離的軍事環境下，軍隊的教育效果往往可以強化正向態度與價值，以及抑制負向的態度與價值。因此，長期接受政治教育影響的志願役官兵，自然在政治態度上比透過兵役管道進入軍隊的義務役官兵來的正向。

三、低政治信任感，但卻是高度認同文人統制

本研究結果與臺灣以往的研究類似，以往研究普遍認為民主化與政治信任呈負相關，但在民主化達到一定的程度後，對政府的信任感不再下降，由於在民主化的過程中普遍對政府產生較高的期望，或因社會複雜化與多樣化，讓政府難以負荷人民的要求，因而導致政治信任下滑，臺灣在民主化的初期也出現類似情形，民眾政治信任感呈現緩步下滑的狀況(陳陸輝，2003；陳義彥、陳陸輝，2002)。以往的研究認為，臺灣民眾政治信任感下滑主要是發生在民主轉型期，即 2000 年政黨輪替之前。首次政黨輪替之後政治信任感大概都維持在一貫低點，不再向下滑落。因此，嚴格來說，本研究結果與以往的研究並沒有太大的區別，基層官兵在政治態度上始終維持中位數以下。

在文人統制方面，一般認為軍人集團較民間社會對文人統制接受度較低。然而，從歷年的調查中顯示，志願役軍人的文人統制傾向普遍高於義務役。以往的研究也發現，民主程度愈高的國家，民眾對文人統制的接受度就愈高，尤其在高度民

主的國家通常會出現軍人在文人統制的認知高於民眾的現象。例如 Snider、Priest 與 Lewis（2001）比較西點軍校、大學儲備軍官訓練團（ROTC）與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對文人統制的認知程度，他們發現雖然 3 種類型的學生都認同文人統制是必要的，但西點軍校學生的認同程度高於軍官訓練團學員及大學生。Haltiner 與 Weibull（2007）的研究更進一步的指出，非民主國家的大學生對於文人統制的認知高於軍校生，而民主國家大學生的文人統制認知反而低於軍校生。

Snider、Priest 與 Lewis（2001）認為民主國家軍校生之所以有高度文人統制的認知，是由於軍校將文人領軍融入於教育當中，時時灌輸軍校生這樣的觀念。相對於一般的大學生及軍官訓練團學員的教學當中，並不會存在類似的課程。由於民主國家將類似的課程內化成軍事專業倫理，透過客觀文人統制的方式從道德上約束軍隊的行為，讓軍人集團產生內在道德的約制力，難以產生與文人集團進行爭奪政治權力之動力。對照以往文獻（李東明，1998；陳膺宇，1996），國軍早在 1993 年左右即開始透過莒光園地電視教學進行「民主憲政教育」，強調軍隊服從依照憲法程序所產生的政府。逐步讓軍人接受民主體系中文人統制的價值，使得軍人即使對於文人政府執政的績效不滿，但仍能維持軍人應有的分際。我國軍隊在民主轉型期就開始實施民主憲政教育，減緩軍人因民主轉型出現動盪而干政。也由於軍隊長期實施政治教育，讓服役時間較長的志願役官兵在文人領軍的認知上，明顯高於義務役官兵。

根據如 Finer（2017: 75-80）的研究，當文人政治執政績效差，或是社會不穩定及經濟發展衰退等狀況下，都會引發軍人對文人政府的不滿，進而出現干政的可能。那麼臺灣在民主化的過程，為什麼一直獲得軍方的支持，沒有出現民主回潮的現象（Huntington, 2012）。從分析中顯示，軍隊文人統制的態度早期民主化的初期就已形成，而且民主實施的初期，基層官兵仍對政治有高度的信任。從 1999 年到 2014 年文人領軍都維持相對較高的水準，顯示在 2000 年政黨輪替之前，基層官兵就已經形成文人統制的概念。雖然，隨著民主化的進展官兵政治需求也同民間社會一樣逐步升高，引發對政府施政的不滿，進而影響官兵的政治信任感，但由於文人統制的態度已逐漸成熟，形成對軍人內在約制，使得軍人雖然不滿於政治現況，但仍必須接受文人的領導。

四、公民責任感的大幅度下降

從調查中發現，軍人的政治態度從 1999 年到 2014 年間出現大幅度下滑的情形，甚至於在 2014 年低於中位數。根據彭懷恩（1997）分析臺灣在解嚴之前政治參與大多基於責任心與義務感，雖然民眾普遍對於政治並不感興趣，但受到義務感的心理影響，使得他們仍參與投票活動，實際上他們對於選舉事務或政治事務並不感興趣。當社會越開放之後，傳統政治價值不再具有約束力，民眾有更多自由的空間，擺脫這種臣屬政治文化下的道德義務之後，公民責任感反而會因此道德約束力的消失而下降。換言之，民主化初期民眾可能受到社會風潮影響而對公民責任感到新奇，但隨著民主化的開展民眾會逐漸回歸理性。對照臺灣自 2000 年以來的總統大選投票率，從八成一直下滑可以得到印證，⁶ 民眾公民責任感呈現下降趨勢。本研究基本上與以往的臺灣地區民主化研究結果一致（吳親恩、李鳳玉，2015；陳光輝，2010），2000 年總統大選後民眾的公民責任下滑，初步證明軍人在公民責任感上與一般社會並無太多差異。

雖然志願役與義務役的官兵在公民責任都大幅度的下降，但志願役下降的幅度到後期有變緩的趨向。2010 年之後，志願役雖然在公民責任感還是呈現下降的趨勢，但沒有像義務役那麼低，因此，在 2010 年以前志願役與義務役的公民責任感無顯著差異，而 2010 年後則出現顯著差異。由於軍人一向重視團隊精神的專業倫理，強調集體利益高於個人利益（Janowitz, 1977; Huntington, 1981），因此，養成較高的公民責任感，使得志願役公民責任感始終高於義務役。而近年來公民責任感呈現大幅下滑，除了是民眾對民主新鮮感下降，對政治要求日益升高外，民主過程中所造成的社會動盪，例如洪仲丘事件及陳水扁總統貪污等施政弊端，都造成民眾對政治的不滿與對政府的信任下降，直接反映於公民責任感上。在政府不值得信任投哪一個都一樣的心態驅使下，使得公民責任感下降。

然而，軍人較一般民眾強調義務而非權利，他們職業所塑造的服從性，很容易形成臣屬性的政治文化，只關注政治的輸出，而對於個人或自己權益的爭取往往較

⁶ 參閱中央選舉委員會選舉資料庫網站歷屆公職選舉資料（2016）（網址：<http://db.cec.gov.tw/histMain.jsp?voteSel=19960301A1>，檢閱日期：107 年 3 月 7 日）。

為保守 (Feaver & Kohn, 2001)。同時，以往的研究也顯示 (Franke, 2001)，軍校生的確較大學生有較高的愛國意識及較低的功利主義傾向。這些因素都助於抑制公民責任感的下降，有效減緩志願役官兵公民責任感下降的幅度，也因此，當社會普遍存在對政治不信任的同時，志願役官兵反而較義務役官兵有較高的公民責任感。同時，也抑制志願役官兵公民責任感的下降幅度。

五、隔離的軍人角色，分歧的公民角色

與軍人角色有關的軍人素養及文人統制，一直以來都是呈現隔離的狀態，也就是凡事與軍人角色有關的政治態度，並沒有因為社會開放或變遷，使得軍人與民眾的態度愈趨向一致，軍人的專業價值上仍與民眾有一定的差異。而在公民角色部分，內在的公民責任則是明顯的隨著時間呈現逐步的下降趨勢。當社會愈是開放或愈民主，義務役官兵愈把公民責任視為個人的權利，而非義務，而志願役官兵雖然也出現公民責任下滑的趨勢，但下滑的趨勢相對較緩和。也就是說，社會開放與民主，也會影響志願役官兵對於公民責任行使的認知，不過此等將公民責任視之為權利的認知，不似義務役官兵轉變的那麼快。顯示志願役官兵仍受傳統軍人講求團隊利益，忽視個人利益等軍隊特質影響。講求團體利益者較重視個人在團體中的責任，而較不訴求個人在團隊中所應得的利益。

不過這種逐步隔離的現象，並沒有出現對政治系統的評價上。一般而言，民眾對政府的政治信任會隨著民主開放，而對政府的信任下滑。由於民眾需求不斷增加，同時，政府透明度愈來愈高，使得政府施政趕不上民眾的需求，導致對於政府信任愈來愈低。但由於軍隊是政府的一部分，軍人是廣義的公務員，因此，軍人對於政府的信任應該遠高於一般民眾，即使隨著民主化，而導致政府資訊愈來愈透明，但軍人的政治信任應該高於一般民眾。研究中的確發現，志願役軍人在政治信任上的確高於義務役。長期而言，並沒有出現下滑的趨勢，這可能是由於政治信任本來就處於相對的低點，所以沒有隨著民主化或社會開放而出現下滑或上升。

雖然，研究發現在公民責任感有從原來聚合逐步走向隔離的趨勢。但 1999 年在公民責任與政治信任都是處於聚合的狀況，也就是在公民角色上軍人與民眾在態度上並沒有差異。顯示，軍人在公民態度有關的事務上，如政治信任及公民責任等態度與一般大眾是聚合的，而與軍事有關的事務，如軍人職責與文人統制則是隔離

的。這說明了，如果內涵指涉的是與公民角色相關的政治態度，義務役與志願役官兵並沒有明顯的差異，但如果是與軍人角色相關的政治態度，則會出現明顯認知上的差異。換言之，在臺灣軍隊與社會既存在 Huntington（1981）所強調隔離的現象，也存在 Janowitz（1977）的聚合現象。不過從聚合轉為隔離，並不是因為民主化，更多的可能是來自於軍隊本身的組織文化，或軍人的職業特性所致。

臺灣軍隊沒有因為民主化而產生聚合的現象。可能是早期臺灣受到反攻大陸的國家政策影響，軍隊為強化社會動員介入社會整體的活動，並擴展軍隊在社會中的角色（例如，軍訓教官、救國團、警備總部等），使得我國軍隊不似西方國家，軍事社會與民間社會相互隔離，反而因應國家政策的需要而整合在一起。臺灣早期在反攻大陸的政策指引下，形成軍事化社會（Bullard, 1997）。由於臺灣軍隊長期擔負國家公民教育的角色，軍隊與社會價值交流變得較為容易，軍隊與社會在政治事務的價值態上不致於有太大的差異（蔡明惠、林長安，2005）。其次，長期以來軍隊實施政治教育，透過電視教學管道傳達文人政府價值，使得軍隊在政治信任與公民責任等政治態度一直與民間社會保持一致，由於軍隊與社會本來就不存在隔閡，因此，也就不會因民主化而產生聚合現象。

其次，在軍事專業與態度上的差異。由於義務役軍人服國民兵役，不同於志願役官兵以軍人為職業，在軍事訓練強度與對軍人的認知有所不同，義務役官兵服役是盡國民義務，而志願役官兵則視軍人為職業，因此，在工作的責任感志願役高於義務役，這可能是使志願役官兵在文人統制及軍人素養等軍事相關的認知高於義務役官兵的重要因素。也可能是職業軍人本來態度就不同於民眾。根據 Dempsey（2009）研究美國職業軍人政治態度時發現，會選擇軍人當作職業的官兵，本來就較認同軍隊的保守價值，而那些不認同軍隊傳統價值者，即使加入軍隊，也很快的會因為適應與認同問題離開軍隊。換言之，志願役與義務役在軍人素養上的差異，可能是來自於義務役軍人本身就較認同這樣的價值，而非軍事社會化或民主化產生的效果。

陸、結論

臺灣從威權體制轉型的過程中，藉由黨國體制維持統治的合法性。同時，黨國統治的合法性也藉由軍隊的政治教育深入部隊基層，以強化政黨對軍隊的控制。因此，以往有相當多的研究認為，國軍的政治教育為黨控制軍隊，灌輸軍隊忠黨愛國

思想的重要管道。然而，以往的研究卻忽略了軍隊政治教育在民主化初期可能產生的影響。由於民主化的初期執政黨為強化權力正當性，同時為回應在野黨的民主化訴求，以維繫其政權的合法性。國軍政治教育的內容從以往的忠黨愛國，轉向以民主憲政教育為核心。本次研究發現在民主化的初期，國軍已具備文人統制的素養，而且志願役官兵高於義務役官兵。顯見，臺灣地區的民主化之所以能夠成功過渡，未發生軍人干政等民主回潮的現象，除了漸進式強化主觀文人統制力度之外，更重要的是在首次政黨輪替前，軍人已逐漸接受了文人統制的理念，為民主鞏固提供可靠的基礎。

其次，本研究初步說明了臺灣軍隊在民主化過程中，即存在 Janowitz (1977) 的聚合現象，也存在 Huntington (1981) 軍隊社會與民間社會隔離現象。當認知的內容是與軍人角色有關的態度時，則軍隊會發展出與民間明顯區隔的態度。但如果是與公民角色有關的態度，則的確會出現因民主化而向民間社會價值聚合的現象。臺灣軍隊在一般政治態度上與民間社會的態度是一致的，而在軍事事務上則呈現一定的差異。但不管是聚合或隔離，職業軍人的政治態度都優於義務役官兵，同時，官兵的政治態度並不會因政黨輪替而有所差異。

最後，一般研究文武關係中的「武」指的是中、高階軍官團，本文採用基層官兵的樣本，除少數中階軍官，大多是國軍的低階官、士、兵，雖然研究對象不是中、高階軍官團，但最起碼說明了基層部隊在政黨輪替前後的政治態度取向。此外，以往軍隊中強調「軍人應了解政治，但不干涉政治」的信念，可能影響官兵對問卷的表態，雖然這種倫理約制可能壓抑官兵對政治態度的表達意願，產生測量上的偏誤。同時，將義務役與志願役官兵態度上的差異，做為文人與軍人態度比較也有欠周延，一般「文」指的是社會中的政治菁英，而以義務役官兵做為文官集團的代表，明顯存在一些差異，雖然未來社會的政治菁英大多會透過兵役管道進入軍隊，但最起碼沒有包含到未來的女性政治菁英。然而，在沒有其他資料可供分析的情形下，對於長期以來軍文隔閡狀況的理解仍有一定的助益。因此，在樣本代表性也有所不足的狀況下，研究結果的推論與使用上要格外的謹慎。當然，本研究只是一項初步分析，未來或可藉由以往實證或檔案資料的分析，獲得更可靠的證據。同時，亦可透過時間序列或內容分析等手段，鞏固研究結果、資料及方法上可能產生的疑慮。

參考文獻

- 余一鳴（2003）。國軍莒光日政治教育問卷調查。國防部總政戰局專案研究成果報告，未出版。
- 余一鳴（2014）。十五年來國軍政治教育效果的比較分析。國防部 103 年度「補助軍事校院教師（官）從事學術研究」成果報告，未出版。
- 吳親恩、李鳳玉（2015）。年齡、就業狀況與政治參與。政治學報，59，81-108。
- 李東明（1998）。國軍政治教育的回顧與展望。載於政治作戰學校政治研究所（編），軍隊政治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7-42）。臺北：政治作戰學校政治研究所。
- 若林正文（1992）。分裂国家と民主化。東京：東京大学。
- 洪陸訓（2002）。軍事社會學：文武關係理論。臺北：五南。
- 盛治仁（2003）。臺灣民眾民主價值及政治信任感研究：政黨輪替前後的比較。選舉研究，10（1），115-169。
- 陳光輝（2010）。民主經驗與民主價值：兩個世代臺灣大學生之比較。臺灣民主季刊，7（4），1-45。
- 陳伯鏗（1999）。軍事基層組織幹部生涯管理之實證研究。臺北：政治作戰學校軍事社會科學中心。
- 陳陸輝（2003）。政治信任，施政表現與民眾對臺灣民主的展望。臺灣政治學刊，7（2），149-188。
- 陳陸輝（2006）。政治信任的政治後果：以 2004 年立法委員選舉為例。臺灣民主季刊，3（2），39-61。
- 陳義彥、陳陸輝（2002）。政治功效意識、政治信任感及臺灣選民的民主價值。2001 選舉與民主化調查研究」學術研討會（10 月 19-20 日），臺北。
- 陳膺宇（1996）。國軍民主憲政教育之探討：以「莒光日園地」電視教學為例。載於政治作戰學校軍事社會科學中心（編），軍事社會科學論文集第一輯（33-72）。臺北：政治作戰學校軍事社會科學中心。
- 彭懷恩（1997）。臺灣政治文化的剖析。臺北：風雲論壇。
- 劉嘉薇、黃紀（2010）。持續與變遷：政治資訊對大學生政治信任感影響之定群追

- 蹤研究。《政治學報》，50，111-146。
- 蔡明惠、林長安（2005）。從支配到支援：1945年以來澎湖地區軍方角色之轉變。《臺灣民主季刊》，2（3），81-115。
- 鄭曉時（1992）。政體與軍隊：臺灣文武關係（1950-1987）的一個分析架構。《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5（1），129-172。
- 穆天威（2010）。我國軍隊士官政治態度影響因素之研究。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
- Almond, A. G., & Verba, S. (1963). *The civic cultur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 Bullard, M. R. (1997). *The soldier and the citizen: 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in Taiwan's development*. New York, NY: M.E. Sharpe.
- Campbell, A., Gurin, G., & Miller, W. E. (1954). *The voter decides*. Oxford, UK: Row Peterson & Co.
- Chambers, P., & Waitoolkiat, N. (2016). The resilience of monarchised military in Thailand.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46(3), 425-444.
- Cheng, T.-J. (1989). Democratizing the quasi-Leninist regime in Taiwan. *World Politics*, 41(4), 471-499.
- Cheng, T.-J., & Haggard, S. (1990). Taiwan in transi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1(2), 62-74.
- Cohen, J. (1988). *Statistical power analysis for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Connaughton, R. (2017). *Military intervention and peacekeeping: The reality*. New York, NY: Routledge.
- Dempsey, J. K. (2009). *Our army: Soldiers, politics, and American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 Diamond, L., & Plattner, M. F. (1996).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and democracy*. Baltimore, MA: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 Erikson, R. S., & Stoker, L. (2011). Caught in the draft: The effects of Vietnam draft lottery status on political attitud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5(2), 221-237.
- Feaver, P. D., & Kohn, R. H. (2001). *Soldiers and civilians: The civil-military gap and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MA: MIT.

- Finer, S. E. (2017). *The man on horseback: 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in politics*. New York, NY: Routledge.
- Franke, V. C. (2001). Generation X and the military: A comparison of attitudes and values between West Point cadets and college students.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Military Sociology*, 29(1), 92-119.
- Fravel, M. T. (2002). Towards civilian supremacy: Civil-military relation in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Armed Forces & Society*, 29(1), 57-84.
- Haltiner, K. W., & Weibull, A. (2007). Value orientations and political attitudes among future military and civilian elites. In G. Caforio (Ed.),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military and parent society in democratic countries* (pp. 51-82). New York, NY: Emerald.
- Hetherington, M. J. (2005). *Why trust matters: Declining political trust and the demise of American liberalis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 Hooker, R. D., Jr. (2003). Soldiers of the state: Reconsidering American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Parameters*, 33(4), 4-18.
- Huntington, S. P. (1981). *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 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 Huntington, S. P. (2012).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 Norman, OK: University of Oklahoma.
- Janowitz, M. (1977). From institutional to occupational: The need for conceptual continuity. *Armed Forces & Society*, 4(1), 51-54.
- Kemp, K. W., & Hudlin, C. (1992). Civil supremacy over the military: Its nature and limits. *Armed Forces & Society*, 19(1), 7-26.
- Kuehn, D. (2008). Democratization and civilian control of the military in Taiwan. *Democratization*, 15(5), 870-890.
- Lee, W.-C. (2007). The greening of the brass: Taiwan's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since 2000. *Asian Security*, 3(3), 204-227.
- Levy, Y. (2016). What is controlled by civilian control of the military? Control of the military vs. control of militarization. *Armed Forces & Society*, 42(1), 75-98.
- Muller, E. N., & Jukam, T. O., (1977). On the meaning of political suppor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1(4), 1561-1595.
- Przeworski, A. (1992). The games of transition. In S. Mainwaring, G. O'Donnell & J. S. Valenzuela (Eds.), *Issues in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The new South American*

- democraci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p. 105-152). Notre Dame, I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 Pye, L. W. (1988). *The mandarin and the cadre: China's political cultures*.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 Quintelier, E. (2015). Engaging adolescents in politics: The longitudinal effect of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agents. *Youth & Society*, 47(1), 51-69.
- Sigel, R. S. (1989). *Political learning in adulthood: A source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 Snider, D. M., Priest, R. F., & Lewis, F. (2001). The civilian-military gap and professional military education at the precommissioning level. *Armed Forces & Society*, 27(2), 249-272.
- Stokes, D. E. (1962). Popular evaluations of government: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In H. Cleveland & H. D. Lasswell (Eds.), *Ethics and bigness: Scientific, academic, religious, political, and military* (pp. 61-72). New York, NY: Harper and Brothers.
- Sun, C.-M. (2001). Taiwan: Toward a higher degree of military professionalism. In M. Alagappa (Ed.), *Military professionalism in Asia: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perspectives* (pp. 61-76). Honolulu, HA: East-West Road.
- Teigen, J. M. (2006). Enduring effects of the uniform: Previous military experience and voting turnout.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59(4), 601-607.
- Warren, M. E. (Ed.). (1999). *Democracy and trust*.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Segregation or Convergence? Changes of Political Attitudes of Members of ROC Armed Forces during the Process of Democratization

Yi-Ming Yu*

Abstract

Soldiers are civil servants in a broad sense, and the military often plays a key role in the process of democratization. Therefore, the changes of soldiers' political attitudes during the democratization proces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indicator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This study analyzed 16 years of changes in the soldiers' political attitudes using empirical data from surveys conducted in 1999, 2003, 2010, and 2014.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apart from a decline in the sense of civic duty during the democratization process, ruling party alternations did not substantially affect other aspects of political attitude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rmed Forces. Among soldiers, political attitudes towards the role of citizens were found to be consistent with those held by civilians, while differences were observed in the two groups' political attitudes towards the role of soldiers. Despite the soldiers' generally low level of trust in politicians, the military continues to play its role as a protector of democracy under the concept of civilian control of the military.

* Yi-Ming Yu, Profession,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Defense of University, e-mail: yuimingtw@gmail.com.

Keywords: civil supremacy, democracy consolidation, civilian control,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political development